

回忆我的父亲杨殷

□杨爱兰口述

父亲与家人

我们家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两者相距不足 100 米。杨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曾祖父杨启文是翠亨富商，早年在美国、港澳地区经商，发达后荣归故里，在村中置办田产、修桥筑路，使得贫困的翠亨村兴旺起来；祖父杨汉川是长子，自幼饱读经书，后考取了秀才，被朝廷敕授修职佐郎，孙中山先生也曾向其拜师学习。

祖父中年尚无子嗣，后续娶一妾，正室才生了父亲。二妈生下一弟熙乐，还有一个妹妹。杨殷是一个孝子。生母死时，他回乡奔丧，从村口一直跪叩到灵堂，这是今人所无的。

祖父有一个妹妹在石岐南门出家当尼姑。杨殷在县中读书时，常到他姑姑的庵堂吃斋。姑姑还给他讲了许多洪秀全等的革命故事，使他从小接受反清教育。杨殷的叔父杨鹤龄，与孙中山先生是挚友，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与孙中山青少年时毁神像、拆庙宇、闹革命的事迹，对父亲起了模范指导的作用。父亲于 1914 年在上海行刺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便是一个实例。

母亲李庆梅是香山麻湾(今珠海斗门)人，也是生长在当地的名门望族。她的几个哥哥都是留学归来的，如五舅父李庆楷，是北京大学教授；七舅父李庆坤，是北京的盐务稽核处处长；八舅李庆余是铁道部工程师。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她和父亲正是门当户对。但母亲受封建毒害甚深，在 27—28 岁时，请相士为她看相。相士说她命薄，过不了 30 岁。自此，母亲就背上这个包袱，郁郁寡欢，患了肺病。父亲对母亲十分要好，常用哲学思想来为她劝解。但母亲始终放不下这个心病，受尽了折磨，终于在 1922 年春四弟刚满月就去世了，成了封建迷信的牺牲品。

母亲去世后，我留在父亲身边，与二弟杨民皓在宿校读书，星期天回家或到二叔处，有时由大叔公陈李济药厂少东陈少泉接去过假日，三妹由杨鹤龄抚养。父亲牺牲后，二弟由舅父供书教学。四弟则由继母潘佩贞带回翠亨村。

继母潘佩贞是陈李济药厂陈少泉二房的养女。自小供书教学，1928 年年初，由陈少泉作主许配给父亲做继室，她自小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她和父亲实际上在香港只过了 2 个月的夫妻生活。父亲牺牲后，她回到翠亨村住，长年照顾我那瘫痪了的四弟。四弟于 17 岁时病逝。

一人革命，大众扶持

翠亨杨氏是一个能接受先进思想的家族。从孙中山年代起，杨氏家族便主动支持革命。父亲参加革命后，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后来父亲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所有的亲朋戚友都一如既往，扶持杨殷的革命工作。继父亲牺牲后，杨东伯父的儿子杨日韶、日璋兄弟，杨万胜伯父的儿子杨维学，还有我的堂弟杨少白等均在全国抗日战争中牺牲。因为翠亨杨氏与孙中山的关系十分密切，彼此就像一家人，叔父杨鹤龄家的后门与孙中山家相通，孙中山几次回翠亨，都通知大家来欢聚、照相。事实上，翠亨杨氏深受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的革命训言也成了杨氏家族的家训，并且受在美国族人的影响，思想上容易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所以众多的杨氏族人为革命前仆后继。

父亲的口才很好，虽然说话有浓厚乡音，但讲话大众化，通俗易懂，有很高的艺术性，对高层人物和低层人物都不同，有人说他有政治宣传的魅力。

父亲参党后，安排堂弟杨标、杨文英、文竹和陆皓东的侄儿晋垣到粤汉铁路工作。他们 4 人在杨章甫、潘兆銮等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工会。文竹是杨殷的文书。文英是情报特工人员，有一次他干了一件很出色的工作，立了功。杨殷代表组织奖给他一个刻有“CP”字样的

银牌。他一直佩戴到 80 多岁，死后作了传家宝。

父亲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时，安排了堂兄杨伯鸣当提犯委员。杨伯鸣是杨鹤龄叔公的亲侄儿，常为父亲提供市公安局方面的情报。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与港英政府勾结，把大批政治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引渡回广州杀害。所谓引渡，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工贼、叛徒在香港追踪共产党人士，勾结港英警察，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拘捕，然后审讯，判递解出境，出境就是将“犯人”押上到广州或上海各地的船上，船到目的地，由提犯委员、工贼会同反动军警在码头口把政治犯逮捕，押回市公安局判处死刑。若港英政府认为是重犯，便直接在狱中移交给提犯委员。堂兄杨伯鸣是提犯委员之一，只要他获得提犯的消息，便立即向父亲报告情况，如果父亲在香港，他就坐早船于下午抵达香港，通知父亲及时组织营救。营救办法一般是在半途截走。有些重犯，父亲在聘请英籍大律师辩护后，通过华人爵士，借到英海军甚至港督游艇，待犯人被押上往广州的轮船，船至珠江时，在海员配合下，营救犯人送到澳门。营救成功后，港督还在梦中呢！

伯公杨瑞芝和帝崔哥，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播宝”和“恰德安”两轮上当买办和管事，他俩常为杨殷送递文件，接送同志来往省港澳。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父亲营救了 10 多位中央和外省来的同志，因为他们都不会讲广州话，通过谭伯(水上人家)划艇送他们到停泊在白鹅潭上的“播宝”和“恰德安”，在伯公和帝崔哥的掩护下，安全到达香港。

叔公杨锡宗，从美国留学归来，当上了建筑工程师，参与设计中山图书馆北馆，在国内事业颇有成就，后来还说服了妻子，变卖自己的房子，将款项支给父亲，支持革命。

香港有一间泰安栈(即旅店)，是邻村三门村的陈凤楷、陈凤源等兄弟所开，他俩是我的表伯。清末，清兵 3 次围村搜捕革命党人，还放火把三门村烧为平地。他们逃到香港开了泰安，后又在广州和上海设有分栈。这不但是父亲在上海、香港的落脚点，也是大革命前后共产党的交通联络站，聂荣臻元帅在广州起义期间就曾在东堤的泰安住过，梁国治和李沛群到上海也是在泰安旅店出入的。

堂兄杨高，他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他在香港希路道有一座洋房，是父亲的活动据点之一。父亲在那里设有支部，省委的领导人在那里开会。一次，父亲被工贼追捕，就是在杨高的管家掩护下脱险的。父亲为了革命，曾向杨高借了港币数万元，用于广州起义筹备和安置起义后来港人员。父亲牺牲后，杨高回到乡下，把我家后花园的六七条防洪基石搬走，其目的有二：一是怕反动派说他借款支持父亲；二是怕留尾巴，后代向我们追债，所以他对村人说：“杨殷欠我的债，我搬走他的防洪基石抵债，今后，两不相欠了”。其实，这几条基石哪能抵得上数万元的债款呢。

借款给父亲支持革命的还有何东的子侄何世光等香港上层人物。他们和父亲是香港英文书院读书的同学。

姑丈张克清在九龙海关工作。经父亲教育，他利用关检的职权，掩护共产党情报人员偷运武器过关。父亲的交通员李少棠就是用父亲特制的夹层皮箱，携带文件、短枪和手榴弹，在张克清的帮助下过关的。父亲牺牲后，张克清悲痛之余，还为我的前途着想，在海关为我选了贫苦出身、品格兼优的丈夫老崔，可谓对我关怀备至。

李少棠是香港早期党员李义保的二姑姑。她是个受尽封建制度压迫的青年寡妇。父亲不但从思想上帮助她挣脱封建迷信的禁锢，而且把她从一个普通女工教育成秘密通讯员，还培养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通过她的关系，在她的姐姐办的教会明德女子学校设立信箱。当年，教会的信箱敌人是不敢检查的。在父亲的统战工作教育下，李家大姐为党设立了信箱，成了安全通讯站，许多中央和省内党的组织文件直接寄到这里转移到父亲手里。

这里，我还要谈谈父亲与陈李济药厂的关系。杨家和药厂家是世交，陈少泉和我祖父杨汉川是好朋友，后来，陈少泉把养女潘佩贞下嫁我父，由好友变成姻亲。父亲经常向陈少泉宣传党的政策，所以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紧要关头，陈少泉能挺身而出，保护党的组织。

王平民是情报站的负责人，在反革命政变之后住在陈少泉家养病，实际上就是父亲通过统战工作所取得的实效。同时，作为药厂少东主的陈少泉，对父亲在药厂工人中开展工作采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不闻不问态度，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扶持革命者。

父女情深

我9岁时母亲去世，那年，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年底，他去苏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苏联人民解放的故事。以后，他工作很忙，很少在家，但我常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父亲对我很严格，但又很慈爱。有一次，我舅舅从北京托人带了一只金华火腿回来。从顺德调来我家工作的平姐告诉我说，明天有火腿吃，我还特意到厨房问何叔叔两次。第二天，我起床后顾不上洗脸，便问叔叔是不是今天午饭吃舅舅送来的火腿。叔叔说，昨天晚上很多人来开会，全吃光了，剩下的骨头煲了粥。我听了有点不高兴。后来，父亲知道了便教育我一番，此后，我就不再小气了。

我常见来我家开会的同志抽烟，又见父亲写文章时咬着雪茄烟沉思，觉得很好玩。一天乘父亲不在家我便在客厅取了一支香烟学抽，平姐生我的气说：“你父亲如回来见到你抽烟，一定不能饶你！”果然，父亲回来，我便把烟收在背后。父亲发现我的异样，便叫我转过身来。我转身时拿烟的手仍是放在背后的，全被父亲看见了。他又好笑又好气，问我烟好不好抽。我知道已被父亲看穿，只好拿出来放在烟灰缸里。父亲并没有大声责骂我，而是慈祥地把我拉到他坐着的皮沙发上，耐心地告诉我吃烟的坏处，还告诉我大人吃烟是不得已的事。此后，我再也不敢去碰烟了。

有一次，二婶给我做了一件花花绿绿的长衣，我穿上了，觉得很好看。父亲回家看见，就问我谁给我穿的，我告诉他后，他就说：“以后叫二婶不要做花花绿绿的衣服了，穿着朴素大方才好”。

广州起义前夕，父亲很想见我和弟弟。陈少泉洞察到他的心事，便嘱药厂工人把我和二弟从学校接回陈家。但父亲因为准备起义，工作十分繁忙，又怕我们姐弟俩缠住不放，便想了一个办法，在陈少泉的小阁楼上通过小花窗，从镜子的反影来看着我们姐弟俩吃饭。第二天，陈少泉的妻子问我们，有没有见到父亲，我说，几个月没有见他了，说着，眼睛都红了。引得她们哈哈大笑，指着阁楼说：“昨天下午，你爹不是看着你吃饭吗？”我急忙走上阁楼去，但是，阁楼哪还有父亲的踪影呢？

1928年暑期，形势更加恶劣，成年人活动十分困难。我也当上了交通员。父亲常叫我把密写的作业送给他的文书陈志远。我手挽藤制书包，来往于港澳之间，从未引起过敌人的怀疑，每次都按照父亲的安排完成任务。

同年5月，他离开广东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听他说当时是打扮成江湖卖药佬跨越国境的。六大后，他回来过一次。我因为几个月没有见他，他告诉我说去游杭州，带给我一张西湖划艇的小照片，还带回一块浮水的西湖石，这就是他最后给我的东西了。

建立特工情报站

由于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人面广，不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和右派，三合会中的绿林好汉、联义社、致公堂等组织中人，他都认识。党建立初期，组织遇到的麻烦事，都经他及时解决。

1924年，父亲便负责党的情报工作了。我记得我时时随父亲去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党部，有一个欧阳峰伯伯，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从西关挑到城里头(即今中山五六路一带)，搜集情报。

伯父杨琛如，住在榨粉街，是同盟会元老，没有人敢动他分毫。他家中放着许多父亲化

装用的衣服、帽子、胡须等物，真是应有尽有。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由继母掩护到杨琛如家住了几天，待风声没那么紧才化装由继母陪伴去香港。

就我所知，父亲的交通联络站有下列多处：麦栏街、海味街4号、榨粉街、曾伟家、高第街和文德北路荣庐。

麦栏街联络站聚集的人比较多，邓中夏、王平民、陈志远与李少棠在这里活动。杨殷化名“李荣”租来房子。这里陈设简单，只有几把藤椅和两张桌子。

父亲精神伴我前行

被捕之后，父亲仍不忘革命，在狱中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士兵和狱卒做大量的宣传工作，最终感动了他们，为父亲传出了给我的绝笔书。他们后来还为父亲、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建了一个合葬的墓。墓上竖了块碑石，上写“龚四君之墓”。

父亲牺牲后，我很久都没有收到他的信，想念他的时候，我就拿出他最后给我的信看，反复地看，信的内容是勉励我努力学习的，他说：“学习得来的学问，是自己的东西，家财是身外物，只有文化科学知识，是自己永远拥有的，你要记住。金钱是身外物”。

父亲牺牲的消息是陈凤源兄弟通过广州泰安栈送来的。过了几个月，二叔、二婶、姑丈才慢慢向我透风，使我有思想准备，然后才告诉我。我听了二叔婶和姑丈讲述父亲的狱中斗争和革命到底的精神，抹干了眼泪，为父亲献身革命而挺起了胸膛。

我在2007年以94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三女儿崔燕薇分两步走，先加入农工民主党，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父亲为国为民、不畏牺牲的精神品质，已经铭刻在我的心里。我不仅要以此教育我的下一代，还要向社会广泛宣传！

（本文根据2012年7月2日采访记录及相关资料综合整理）